

目次

高爾基和列甯

初次會晤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旅行到美國

在倫敦會議中

列甯的演說

列甯與工人

在巴黎的會見

列甯在義大利

山
谷
組

三

三

二

六

一

一

七

一九一七年我和列甯的爭論

四

「真理的完滿的具象」

六

關係知識分子和專門家

三

革命策略

五

列甯的性格

四

對於同志的態度

三

普洛文學

六

附錄 列甯給高爾基的十五封信

「

高爾基和列寧

勿拉得米列寧死了。世界已經失掉了一個卓越的天才，比較他的同時代的任何大人物都更偉大得多，這是連他的某些敵人也敢於承認的。下面的話是在捷克出版的資產階級的德文報普拉格日報論列寧的結語——這論文的基調對於他的雄大的人格是表示敬畏的：『偉大而且可怕以至超於我們的意想之外，即令是在死了之後——這樣一個列寧。』顯然的，在這論文裏所隱伏着的情感並不是單純的幸福樂禍，並不是大儒派所謂『敵人的尸體總是香的』；也不是因為一個偉大而驚人的『精神』的消逝而感覺釋然。那確乎是在誇耀一個偉大的人格。

● 列寧本名為勿拉得米伊里奇烏里亞諾夫 (Vladimir Ilitch ulianov)，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對於列寧的死，白黨的報紙既沒有道德的勇氣也沒有良好的鑑賞力，並不能表示資產階級報紙對於這以無畏的理性和堅強的意志生活過來的最高模範之一的人格所表示的敬意。

要描寫勿拉得米伊里奇列寧的肖像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作為他的外表的一部的他的言詞是多得好像魚的鱗片似的。他所說的各樣事的簡明和爽直，正是他的性格的一種主要表徵。他所成就的英雄事業並沒有那種環繞在聖像頭上的光圈。他的行為是俄羅斯人所熟知的那種英雄主義——俄國真正革命的知識份子的那種自我犧牲的刻苦底，嚴肅底生活，他們不可動搖地堅信社會正義在人間的可能，捨棄一切生活的歡娛而為人類的幸福勞苦着。

在他剛死以後我所寫的關於他的文字——那時我被哀愁所壓倒——是匆促寫成而且不適當的。那時因為有所顧忌，許多事我都不能寫出來，我希望這是可以充分諒解的。他是一個明察的，大智慧的和『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

他往往能夠看得很遠，而且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間談論人物的時候，他就常常確切地預言了他們在近幾年間的變化。這些預言不一定叫人高興，而人也不常相信牠們，但是不幸他的疑慮之詞已經在許多事實上證明了。

初次會晤

我的前次的問世錄的不滿意的性質。由於許多缺漏和矛盾的發現而日見其增加了。我本來應該從倫敦大會。說起，那時烏拉得米伊里奇正在屹然挺立於疑惑，誤解，和公開敵對，甚至仇恨的境地之中。

現在我還分明看見倫敦郊外的木造教堂的光禿的牆壁——簡陋到荒唐的程度和那或許作過可憐的學校教室的狹小的廳堂的尖圓形的窗子。

和教堂相似的不過是這建築物的外表。內面却沒有一點教會的跡象，甚至那

● 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舉行於倫敦。

4
講台也不放在廳堂上方的頂端，却擱在入口處的兩道門之間。

這以前我不曾見過列寧，也不會讀過我應該讀的關於他的那麼多的事情。但是我曾經設法讀過的，以及與他親近的人們的熱心的敘述，已經強烈地引動我心嚮着他。當我被介紹的時候，他誠懇地握着我的手，並且，用他的銳利的眼睛審察着我，然後用一種故交的聲調玩笑似地說：『你這樣高興的來了。我相信你是喜歡打架的吧？這裏正有一場絕好的格鬥。』

我想不到列寧是這樣的。他缺少某種東西。他用喉音發着『R』的捲舌音，而且把雙手插在腋下逍遙地站着。他似乎太平凡，並不給人以自己是一個領袖的印象。作爲一個文人，我必須留意那些細節，而這種必須已經成爲我的習慣，有時這習慣是惱人的。從前，我初次會見蒲列罕諾夫的時候，他抱着手，嚴厲地看着我，略帶一種過勞的教師看着多餘的學徒的厭煩的表情。他所說的話我一句也不記得了，除去這極其平淡的套語而外：『我是你的作品的一個賞鑑者』；而

且在會議的期間，我或他都沒有想要互相談心的意願。

此刻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個禿頭的，矮胖的，堅實的人。說着喉音的「R」的捲舌音，一隻手握着我的手，另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他的亮得出奇的眼光懇切地照耀在我身上。

他立刻開始談論我的母親的缺點——顯然他已經讀過存在於支尼可夫的手裏的那稿本了。我說我倉促寫成了這本書——但是沒有說明爲什麼。列寧同意地點點頭，自行給以解釋：是的，我應該趕快寫好，現在需要這樣一本書，因爲許多參加革命運動的工人是這樣隨便，這樣含糊，給他們讀一讀母親是很有益

● Plekhanov, George V. (1850—1918) ——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初與列寧合作，共同領導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成爲孟雪維克派領袖，與列寧所領導之布爾雪維克派對抗。在大戰中支持俄羅斯帝國主義；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政府甚力。

● Ladysnikov, S. P. ——革命前，一個出版公司的經理。

的。『正當其時的書。』這是他給我的簡短的批評，但是我以為這是最可珍貴的。

然後他鄭重其事地詢問，這書被翻譯了麼，經過俄國或美國的檢查官的斧削了麼。當我告訴他作者已經被檢舉過了的時候，他初而皺眉，繼而仰起頭，閉着眼睛，然後爆發了異常的大笑。這一笑召來了幾個工人和烏拉爾斯基——我想是他——還有別的一些人。

那時我在一種慶幸的心情之中。我在三百個精選的黨員之中，我知道他們是由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來出席的。我的眼前全是黨的領袖，老革命家蒲列罕諾夫，阿舍洛得^①，和杜才^②。我的慶幸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而且將要被讀者所理解的，當我再加說明我在離開本國這兩年間，我已經受得極其頹唐了的時

① Axelrod, Paul B. (1850—1923)——於一八八三年間與蒲列罕諾夫組織勞工解放團；後來成為孟西維克派的著名領袖之一；反對蘇維埃政府；第二國際的幹部。

② Deutsch, Leo G. (1855—)——一八八三年間為勞工解放團的領袖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與蒲列罕諾夫合作，反對蘇維埃政府。

候。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我的頹唐開始於柏林，在那裏我會見了社會民主黨的諸領袖，並且和伯伯爾，辛格——一個很肥胖的角色——會餐，周圍全是些名人。

我們在一間寬敞而舒服的房間裏宴會。風雅的，繡花的罩子，罩着幾隻金絲鳥籠，繡花罩子披在手椅的靠背上，以免坐在牠們上面的人們的頭會沾污了那些椅套。各樣東西都穩當而且牢固。各個人都莊重地吃着，用莊重的腔調互相談論着『露爾次提』。這對於我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是我知道『露爾』是法語的『壞』，而『次提』是德語的『時候』——『壞時候』。

● Babel, August (1840—1913)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 Singer, Paul (1844—1911) ——與伯伯爾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品格一再稱呼考茨基。爲『我的浪漫主義者』。伯伯爾，以及他的鷹鼻子，對於我似乎有些揚揚自得。我們喝着萊茵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微溫的。啤酒是好的。諸位社會民主黨人尖酸地和虛謙地談論着俄國的黨和革命，但是不談論他們自己的黨，德國的黨——一切都好極了！一派揚揚自得之氣。連那些椅子也似乎欣欣然承受着諸位領袖的光榮的屁股。」

我和德國黨的關係是頗爲微妙的。一位重要的黨員，就是那後來著名的巴爾羅士，曾經得到支南尼伊。許可他向各劇院收集我的下層的版稅。一九〇二年他潛自到西巴斯陀坡，在車站上取得了這許可。他收集的錢是這樣分配的：百分

● Kautsky, karl (1854—) 德國馬克司主義的理論家；後來是反共產主義的理論家。

● Parvus (A. L. Helfand 1869—1924) ——德國馬克司主義者，亡命德國，於一九〇〇年

間，活動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之中；後叛變，在大戰期間，充德國間諜，從事軍火商業。

● Znanieye——當時布爾雪維克的一個合法出版物。

之二十歸他，其餘的四分之一歸我，四分之三作為社民黨的經費。巴爾維士當然知道這些條件，而且高興這樣辦法的。四年以來，這劇本輪流上演於全德國各劇院，單是柏林一處就上演過五百多次，所以巴爾維士必定收到了十萬馬克。但是他送給支勒尼伊的（負責人）庇提尼次基的並不是那款項，而是一封信，很幽默地通知他他已經把那筆款全化在和一位年輕女人到義大利去的一次旅行上了。因為我個人對於這一次必定很快活的旅行有那一筆錢的四分之一的關係，我認為我自己應該通知德國黨中執會關於那四分之三的事。我的信是由勒得支可夫轉交的。那中執會對於巴爾維士的旅行毫不動容。後來我才知道他已經被黨開除了；老實說，我是喜歡看見他被責罰的。過了不久，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有人指給我有一位極其漂亮的年輕女人，說這就是和巴爾維士同到義大利去的旅伴。「一位很貴的少奶奶」，我想，『很貴』。

● 英譯本，意謂「很貴」或「親愛的」，此處應作雙關語。

在柏林我會見許多人——作家，藝術家，文藝愛好者等等。他們的自得和自尊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旅行到美國

在美國我會經多次會見莫里斯赫爾格，他的雄圖是要作紐約的市長或省長。我見過許多人或許多事，但是我沒有會過一個能夠理解俄國革命的全部意義的人，而我在各處覺得一般人都把牠當作『不過是歐洲的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是在那『不是虎烈拉便是革命』的國家裏的常事——這是『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一位『漂亮太太』的話。

● Morris Hellenic (1870—)——美國社會黨領袖；富足的律師；大戰後主持反蘇運動；現為美國右派社會黨領袖。

到美國去募集布爾雪維克的經費這意見是克拉辛提出來的。孚洛夫斯基和我同去，作為秘書和各種集會的組織者。他深通英語，但是黨要他作別的工作，又派了布里尼來代替他。他不懂英語，在途中纔開始學習，一直到美國還在學習。

社會革命黨知道了我的旅行的目的的時候，他們發生了孩子氣的趣味。我還在芬蘭的時候，柴可夫斯基和支托洛夫斯基就來向我提議：款項的募集不應該專為布爾雪維克，而應該是為『一切革命』。我拒絕了為『一切革命』募款。因此他們也派了『祖母』。到那裏去，於是在美國就出現了兩批各不相干而且連爾都

● Krassin, L. B. (1870—1926)——老布爾雪維克領袖，十月革命後曾任蘇聯政府要職；曾任蘇聯駐英及駐法大使。

● Vorovsky, V. V. (1871—1923)——老布爾雪維克領袖之一。一九二三年代表蘇聯出席洛桑會議，被反動派所暗殺。

不見的募款人，顯然爲了兩個不相同的革命。

美國人自然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考究哪一個更好，更可靠。「祖母」顯然已經著名於他們之間——他的美國朋友早已替他散過廣告了——而且沙皇的大使已經替我預備下一場侮辱。美國同志也把俄國革命當作「局部的」，無結果的事，所以對於我在各集會中募集的款也就頗爲「自由」了。總之，我募得的錢很少，不到一萬美金。我決定寫些報紙文字弄一點錢——但是在那裏又碰見一個巴爾維士，於是這一次旅行就算全盤失敗了。然而我寫成了母親——牠是在美國寫的這一事實，或許可以說明牠的錯誤和缺點。

● 俄語「巴比希卡」，意云「毒藥」；當時俄國無政府黨員被稱爲巴比希卡，意爲「俄國革命的毒藥」。在大戰中維克多斯基政府；十月革命後她是蘇聯的最惡毒的敵人之一。

● 高爾基——對美國就遭受所謂「社會制裁」，因爲他「非法結婚」云云。他被追離兩度，駐在莫斯科。

然後我去到義大利，到加普里，而且沈溺在俄國書籍和報紙裏邊——這也增加了我的煩瑣。倘若被拔掉的牙齒也能夠有所感覺，那麼牠或許能夠感覺我所感到的孤另了。我很吃驚於某些著名人物從一個政治講壇跳到另一個去的那種變戲法似的伶俐和輕快。

『各樣都喪失了，』他們說。『他們已經打倒，勦滅，放逐，囚禁了每一個人！』

這是多麼可笑，然而沒有一點可喜的光輝。一位從俄國來的訪客，一位有才能的作家，說我已經盡完了下層裏面的陸卡似的任務——已經用阿諛的言詞討好了青年們，他們曾經相信了我，曾經碰了釘子，而我已經逃掉了。別的一個却宣言：我是被『傾向』銷蝕了的，我是一個『墮落的』人，而且我反對一切舞曲，僅只因為那是『帝國的』云云。總之，他們說了一大堆愚蠢可笑的話，而我常覺得好像一陣瘟疫的風塵正在從俄國吹來。

這時忽然，好像在神仙故事裏面一樣，我發見我自己坐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會議席上，自然這對於我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在倫敦會議中

但是我的慶幸的心情不過持續到第一次會議，當他們爭論『議事日程』的時候，那些爭吵的氣餒立刻冷卻了我的熱情，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黨已經那麼尖銳地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這是我在一九〇三年早已明白了的——而是因為改良派對於列寧的敵意。那敵意從他們的演說裏淋漓着而且噴射出來，好像在高壓下的一條舊水龍軟管裏的水似的。

重要的不一定是所說的是什麼，而是怎樣說出來的。蒲列寧諾夫穿着燕尾服，嚴密地包裹着，好像基督舊教的牧師似的，而且說話也像傳教士，自以為他的意見是不容置辯的，每一字每一頓都大有價值。在代表們的頭上他機巧地播弄

着他的美麗而圓熟的詞句，只要布爾雪維克的同志有一點聲息或私語，這尊貴的演說家就稍稍停一停，向他投去針似的一瞥。蒲列罕諾夫最寵愛他的一隻鈕釦；他隨時都用手指愛撫着牠，而每一停頓的時候，就按着牠好像按着電鈴似的——停止了牠的演說的奔流的似乎是由於那一按。

在一次會議中，當蒲列罕諾夫起來答覆某人的時候，他的手抱在胸前，發出大聲的輕蔑的『咳！』這引起了布爾雪維克的工人們的哄笑。蒲列罕諾夫豎起他的眉毛，他的一邊面頰也蒼白了。我說一邊，因為我坐在演台的旁邊，祇能看見這演說家的側面。

在第一次會議中，當蒲列罕諾夫演說的時候，在布爾雪維克席上最感不快的是列甯。他一會縮緊他的身體好像怕冷似的，一會又伸開好像覺得悶熱似的。他用手摸摸腋下，摸摸下巴，搖搖頭，又悄聲和托木斯基說話。當蒲列罕諾夫申說黨裏面並沒有所謂『修正派』的時候，列甯低着頭，他的頭上的禿塊發紅了，並